

历史语境视域下李大钊与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构

赵 雪

(唐山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对促进中国传统史学现代化和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李大钊史学思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和逻辑理路,他联系中国革命的具体进程,对历史、历史学、历史观以及史学与人生、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等作出了精辟论述,强调要以“新”历史观指导史学研究,重视史学的理论基础,把“活历史”放入整个历史进程之中,以“民众”为基础建构“平民”的新历史,最终本着建设社会主义的价值旨归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等方面,这些思想对于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原创性贡献,确立了中国历史研究的价值意义和目标取向。

关键词:李大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唯物史观;活历史;历史语境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2)05-0001-09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2.05.001

Li Dazhao and China's Marxist Historiography Construction: A Historical Context

ZHAO Xue

(School of Marxism,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pione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nd the founder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Li Dazhao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s historiography theory had its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and logic. He connected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made incisive discussions about history, historiography, historical thought, historiography with one's life, and the status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science. Through the discussions he emphasized the need to guide historiography research with a “new” historical though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historiography, put “living history” into the entire historical process, build a new history of “civilians” on the basis of the “people”, and finally build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with the socialist values construction. In terms of historical thought,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paradigm, these ideas have made original contribu-

基金项目:教育部 2022 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22JDSZK012)

作者简介:赵雪(1984—),女,河北唐山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d established the value meaning and go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

Key Words: Li Dazhao;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iving history; historical context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所导致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严重冲击着中国传统史学。此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萌芽,“并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对传统史学进行了初步的批判”^[1],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对史学变革的要求,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构创造了学术条件。1924年出版的李大钊《史学要论》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2]77},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式走上历史舞台,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中国“新史学”自然发展的螺旋迭代以及现代史学建构的发端。李大钊在史学思想理论上的伟大创见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3-13],但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构的关系问题还需放入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李大钊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在实践中建构了史学特有的话语语境,以“改作”“解喻”等方法,使历史成为“活历史”,并紧密联系中国国情,引领中国革命进程,实现了高度的“历史自觉与理论自觉”^[14]。因此,只有回到特定历史场域并进入特定历史语境中,才能深刻理解和把握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研究中国化的道路上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一、李大钊唯物史观的确立

李大钊坚定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来自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知与信仰,体现了高度的历史自觉。

(一)以认识论为导向的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

在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李大钊在求学阶段的史学思想就已初现唯物史观的萌芽。1914年,他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中阐述了民彝思想,认为民众是创造未来的“新势力”。1916年8月,他在《晨钟》之使命——青

春中华之创造》中论证了青年的历史主体性,并将再造“青春之中华”的希望寄托于青年,鼓励青年努力为国家而奋斗。

俄国十月革命使李大钊的认识视野和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首先,由“民彝”史观转向群众史观。李大钊考察了俄国革命中工人阶级为实现阶级利益而斗争的状况,并被群众参与社会变革的力量所感染,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由此断定,俄国的胜利是20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15]由于当时的俄国国情与中国相近甚或相同,李大钊认为必须适应世界新潮流,走俄国人的路。自此,李大钊开始转向唯物史观,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其次,由进化论者向革命论者转变。十月革命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完成社会形态更替,创立了劳工政府,这对李大钊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抓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关键性的认识论命题对中国状况作了具体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是新世界取代旧世界的理论武器,从认识论的高度肯定了十月革命的意义。最后,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历史变动的原因。李大钊在求学阶段就接触到了新思想,曾把目光集中于英美等发达国家,从先进的思想意识角度来研究社会变迁。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开始试图从经济角度揭示历史变化的动因,将“一战”爆发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发展打破了国家界限。他将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应用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之中,关注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大哲学命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李大钊科学严谨的史学论证还体现在其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放到近代西方历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启发李大钊提出建立新的历史哲学学科的设想”^[16],通过评述西方历史学者的社会形态理

论以及对西方学者关于历史观念的总结,论证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合理性^[13]。李大钊首先肯定了鲍丹在探索唯物史观起源方面的贡献,之后又肯定了韦柯基于历史的人间经验事实创立的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系统,成为“唯物史观的提倡者”^{[17]393}。孔道西也认为历史是进步的,并影响了提倡“黄金时代说”的圣西门。在历史观的演变历史上,李大钊认为鲍丹、韦柯、圣西门等学者对唯物史观都有直接的贡献或启发,同时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以“人的理性为根据的”、“复古的循环的”等错误的历史观。李大钊注重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探讨唯物史观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进而从认识论及学术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唯物史观的价值。

(二)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史学研究实践

李大钊由初识进化论到信仰马克思主义,再将唯物史观运用于革命斗争的过程,展现了李大钊追求真理、毕生“矢志致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斗争历程^{[18]297}。虽然梁启超等人曾力图打破封建观念束缚,用西方进化论来重新解说历史、革新民史,为建构科学的历史学作出过积极的努力,但“五四”之后,梁启超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为“心力”而不是物质,则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家难以承担构建历史科学的重任。陈独秀为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而研究中国近代史,但他的研究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性的支撑。唯物史观以历史发展规律为前提,科学地阐释社会形态更替的原因,以群众史观为中心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适应了“史学革命”所要建立的新史学的要求,从而使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学术史上有了初始的流布空间。

1917年,在俄国发生大革命以及世界劳工运动风起云涌之时,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中国舆论中发声,《新青年》《晨报副刊》都设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号、专栏,这些专号、专栏成为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使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形成了一股潮流并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之中。1919年后,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系统

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高校讲授唯物史观等课程,并在武汉、上海、开封等高校讲学,从学术建制的层面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门人才。这些学生大部分成为党创立时期的骨干成员,一大批青年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李大钊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生根发芽,并与中国革命的实践有机结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道路。

二、李大钊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关概念的历史语境解读

关于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已有很多学者进行过深入阐释,他们认为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13,19-22],不同时期的研究者只是在概念解释上有所不同。李大钊是“五四”时期对“主义”的积极追寻者,把李大钊的史学理论放入特定历史时代方可理解李大钊对于历史相关概念的阐释。李大钊史学思想的文本表述离不开历史语境的支撑,中国近代以来的自救道路已经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了关于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的基本框架。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所说的“古今中外法”也意在强调研究问题要注意时间和空间,将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李大钊以历史理论把握社会现实,触动时代问题焦点,积极回应中国革命的具体进程,是20世纪初期内外交困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在史学领域的一种现实反映,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理性和正确性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论证和方法论指导。

(一)关于历史、历史学与历史观的阐释

李大钊关于历史、历史学、历史观的概念阐释一直聚焦于社会现实领域,指出历史是属于社会生活的范畴。李大钊在解读人类史时指出,“史”的本意是从实际生活中出发的,“人类的历史,乃是人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23]275}。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李大钊解读“历史”的概念与传统经世史学不同,历史有历史资料和历史著作

的界限,不仅仅有“记录”功能,还应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建立在人类生活、社会变革的基础之上。历史作为已经发生过的存在,从纵向发展上看,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17]525},体现着动态过程中的整体性特性。历史有独特的生命力,它的延续是人类全部生活的延伸和接续,人类所有的生产、生活进程也终将流入历史的长河中。

历史研究的任务是什么?怎样建立独立的史学体系?这就涉及到历史学的范畴。在唯物史观视域下,除物质生产方式外,人的精神需求还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衍生出作为上层建筑的历史学。首先,李大钊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维范式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认为“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17]527}。其次,为了提升历史学的解释力,以达到以理论指导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李大钊主张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要从经验描述性方法向推理的方法过渡,形成本土学术的逻辑自觉,这样历史学的理论结构便与中国社会现状形成了有机互动的整体,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够在学理上和实践上达到学术的高度。最后,李大钊对历史学进行了详细的划分,从哲学史和历史哲学的角度,区分了记述的历史和历史的理论,强调历史哲学研究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依据哲学的考察对历史科学提出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提升了历史学研究的高度,这对于建立科学的历史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历史观涉及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导向。旧史学认为“历史的内容,主要部分是政治、外交,而活动的事迹,完全拿贵族当中心”^{[17]524}。这种对历史内容的狭隘理解是源于封建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的英雄史观或帝王中心史观。这看似是历史研究的侧重点或是史书体例的问题,其实是历史观问题。历史学家是历史研究的主体,在认识、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其主体意识发挥着关键作用,离不开一定的历史观指导。李大钊并不赞同历史学家不带历史观色彩去研究历史的观点,认为史学家只有在历史观的指导下才

能掌握处置和分析史料的准绳。同唯心史观相对比,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它克服了旧历史观中思想和权力决定一切的观点,论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事实上,就李大钊所生活的时代而言,他所了解的唯物史观理论大多来自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及其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引进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于 1932 年才由苏联出版了德文版全文,中文译本(郭沫若只译出部分文字)直到 1938 年才出现。可见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李大钊并没有接触到唯物史观的核心原著文献,但是他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解却是较为准确和中肯的,以“中国化”的内需为导向,并对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派反对史学家主体意识参与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为科学地研究历史提供了一把钥匙。

(二)“时”与历史关系的解读

时论在李大钊的史学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李大钊认为“今”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它为人类的创造活动提供了机会。李大钊十分看重人在历史中的能动作用,从毅然弃学归国参与反袁斗争来看,他对民族的发展前途进行过深入的审视和思考,所以才会发出“复活”中国的呼唤,这种“复活”正是一种能动的体现,即是要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内在的积极性。李大钊受到柏格森时间观的影响,从时间本身来理解时间,把时间理解为一个大生命^[24]。1923 年 11 月,李大钊发表的《时》阐述了“时”与历史的关系。他说:“一生最好是少年,一年最好是春天,一朝最好是清晨。……时是伟大的创造者,时亦是伟大的破坏者。历史的楼台,是他的创造的工程,历史的废墟,是他的破坏的遗迹。”^{[17]450}但是“时”有着玄妙的含义,难以捉摸,我们唯一能把握住的東西就是“今”。“今是生活,今是动力,今是行为,今是创作。”^{[17]451}在“时”与“今”的辩证统一发展中,李大钊看到了现实力量的强大,指出人要把握住机会就必须最充分地利用他们占有的每一时刻,即“机会不可复得,因缘永难再遇”^{[17]452}。

李大钊在《时》的文本阐释中强调,只有了解历史,才能珍视今天的创造机会。“我们要改变这误谬的时的观念,改变这随着他产生的误谬的历史观、人生观,要回过头来顺着向未来发展的大自然大实在的方面昂头迈进,变倒退的为顺进的,变静止的为行动的。”^{[17]453}“谬时”产生的原因在于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而这个环境是由前人创造出来的,即当时的社会形式。既然固定生成的社会形式无法改变,所以要充分发挥人的积极的能动性,变“谬时”为“新时”。这种能动性建立在承认历史作用的基础之上,不重复历史,也不完全否定历史,这种辩证的唯物史观鼓励人们把握住客观实际,付诸真的行动。

(三)史学与人生诉求的关联阐释

对于历史学的功能问题,李大钊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史学是人生的科学,从认识论的高度区别于中国传统史学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李大钊将“主义”作为青年“价值重建”的根本,突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的方法论导向。传统史学的功用主要集中在“惩劝”与“资鉴”上,更多强调资政和教化,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而李大钊的历史学功能则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展现出新的内容: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我,即人们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和研究,可以达成人生诉求,自觉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他把史学与“科学的态度”及“人生观”联系起来,展示给世人一个进步的世界观,也反映了他对史学功能的深刻理解。

“乐天努进的人生观”来自正确的历史观,史学对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是积极能动、潜移默化的,甚至能够激发人们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史学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有引导作用,这种作用通过其“铸魂”的育人功能得以实现。李大钊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少年时代便勤奋好学,东渡日本求学亦是为积累渊博学识以求真理;他为塑造一可爱之国家而深植“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爱国思想,这种爱国情怀为其一生壮丽的革命事业埋下了理想的种子。

三、李大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

与近代“新史学”的史学革命不同,李大钊要建构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史学,即由理论分析转向动态的历史考察,在批判中国传统儒家治史方法和唯心史观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社会变化相结合,对关乎历史研究的根本问题作出回答,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动态的革命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构,在改变旧世界、建构新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新史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非常重视并反复强调历史观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的人,李大钊排在第一位。作为历史学家,历史观是其进行研究的基础,这种自觉的历史观在实践中形成,体现为历史研究和考证的原则和立场。没有正确的历史观作指导,便无法进行科学的历史研究。“真正的历史观”应追溯到欧洲的科学革命,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产生,则使史学研究进入科学范畴。唯物史观是一种新史观,它摆脱了传统的神权史观、精神史观的束缚,创造出一种理性方法论以服务于历史研究和现实需求。

新史观对于人类有重要的影响。从前的史书都认为天地变异与神意或君德有关,人类的文明成果以及人类生活的进步都自然归结于圣人之功,这也是中国衰落的历史观的表现。对于史学家而言,应先有正确的历史观,然后才能把握研究历史的准则。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容易被误导,亦不能达求真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至今对于史学工作者仍有重大的意义。

(二)理论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内核

历史学只有具有了科学的特性,才能上升到科学的地位。在对历史科学的认知问题上,有学者认为李大钊“所谓的历史科学,就是史学研究中的历史本体论和史学认识论问题”^[5,25];

也有学者认为历史科学“由科学探求理法的特点所决定”^[26]。而事实上,李大钊认为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是要有正确的历史观,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历史观去考察社会发展,就会走入历史研究的误区。要使历史学上升到科学地位,就不应仅停留于对史实的整理和记述,而应在史实整理和记述的基础上作“事之理论的研究”,并“建立历史的理论”。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找到了研究复杂历史现象的理论武器,论证了历史发展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肯定了历史学同样能够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他认为建立历史学理论体系的方法是:“个个事实的考证,实为一般理论的研究必要的材料。必个个事实的考察,比较的充分施行,而后关于普遍的理法的发见,始能比较的明确。”^{[17]533}

1920年,通过教学与史学理论研究工作,李大钊在学术上为建立真正的历史科学迈出了第一步。从1920年至1924年,他先后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史观》《今与古》等文章,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史学要论》,确定了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意义。兼有学者和革命家双重品格的李大钊,在史学研究的实践中以科学的历史观为指导对人类的历史作出了解释,从考古学、生物学、社会学及人文科学等多领域的考察结果出发,考证历史事实,留下了具有理论性、学术性的思想史料,将中国历史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民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政治关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民众史观为核心,形成了史学研究者与意识自觉、方法运用和具体历史问题研究的良性互动,这是近百年中国历史学在唯物史观影响下形成并展现的本质特征。李大钊重视民众的力量,承认“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23]20}。李大钊在求学阶段就开始思考民众的意义,在《政治对抗力的养成》《民彝与政治》中多次阐述对民众的看法,并试图在史学研究中证明历史

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李大钊的民众观也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得到进一步发展,经历了由民、民彝、平民到人民的逻辑演变过程,把民众视为“历史的纯正的主位”,始终强调民众有自我解放的能力。可以说,李大钊一经接受马克思主义,民众史观就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23]18}李大钊肯定阶级斗争对于历史进程的作用,也必然肯定社会形态更替中民众的主体性地位。离开广大民众,社会革命单靠少数英雄人物恐怕永远不能实现,要充分“认识民众势力伟大”“民众是永远的胜利者”。民众是现代一切构造的唯一基础,一切反动势力“不遇民众的势力则已,遇则必降伏拜倒于其前,不犯则已,犯则必遭其殄灭”^{[23]262}。因此,李大钊号召民众应“自觉其权威而毅然以张用之”,“竖起民众万能的大旗”开展民主运动,创造“平民”的新历史^{[23]263}。

(四)“活历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意涵

与传统历史学家所不同的是,李大钊把历史分为活着的历史和死去的历史。“所谓活的历史,不是些写的纪的东西,乃是些进展的行动的东西。……而历史的事实的本身,则永远生动无已。不但这整个的历史是活的东西,就是这些写入纪录的历史的事实,亦是生动的,进步的,与时俱变的。”^{[17]522}而死的历史“有实在的过去,有历史的过去:实在的过去,是死了,去了;过去的事,是做了,完了;过去的人,是一瞬长逝,万劫不返了,在他们有何变动,是永不可能了”^{[17]522}。他批判封建的、旧的历史观,在继承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革命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指出历史的真相蕴含于活着的历史之中,只有活的历史才能道出历史的真实。历史研究不应停留在实证主义史学所理解的史料收集和整理的过程,而应更加注重研究现实的社会问题,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历史学研究提供

了新的视角。

相应地,死去的历史和活着的历史又把历史分为实在的事实和历史的事实。实在的事实是客观的过去、是陈旧的,而历史的事实是史学家认识的过去、是常新的。社会在不断进步,人们的认知也在不断改变,史学研究就是将实在的事实不断转化为历史的事实的过程。“去年的真理,到了今年,便不是真理了;昨日的真理,到了今日,又不成为真理了。”^{[17]523}同一史实,今天的解释会和以往有所不同;同一个人对于同一个史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资料的发现,其认知也会发生改变。所以,李大钊史学理论中的历史是需要“解喻”的。“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解喻是活的,是含有进步性的,所以历史的事实,亦是活的,含有进步性的。”^{[17]522}如果历史不被“解喻”,那就只能是“无生命”的过去。对活的历史进行解释,把历史看成现实社会所需要的有意义的载体,不把史学研究固定在僵死的范围之内,这才是史学研究者的真正的任务。但没有一个历史事实能穷尽全部真理,所以现代史学者的责任还需“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17]322}。这里的“改作”不是指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或改变历史,而是指以承认客观规律为前提对历史进行合理“解喻”。

(五)社会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价值归宿

在李大钊的视野里,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再生与复兴同社会主义形态相联系。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研究紧扣中国近代社会去旧图新的主旋律,以探索社会变革之理法为诉求,服务于中国近代社会的除旧布新。他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展开论战,为唯物史观进行辩护,实质上就是为科学社会主义进行辩护,是对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与合理性进行论证。他指出:“科学的社会主义,把他的根据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的到来。由此说来,社会主义的社会,无论人愿要他

不愿要他,他是运命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17]408}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便是李大钊所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拿着新的历史眼光,去观察数千年前的故书陈籍,的确可以得着新的见解,找出真确的事实。”^{[17]464}这种真实也包含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应有之义。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李大钊第一次提出并初步论证了未来中国社会主义的特征,通过对社会主义前景的基本判断,揭示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离不开对中国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这一富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命题。社会主义作为“有力的政治运动”,从社会形态更替的角度上看,在中国的发生具有其历史必然性。正是在唯物史观的积极影响下,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面貌,证明了作为价值归宿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得到发展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四、李大钊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意义

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写道:“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18]301}他对史学理论的探索是系统深入的,其对历史观的思考视角十分独特,能够敏锐把握中国实际,关切民众及国家命运。他不仅以科学的历史观指导中国的史学研究,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基本立场出发去考察“活历史”,更重要的是针对如何创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在中国史学界,李大钊以唯物史观为根基,开创性地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形态。

(一)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体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而建构中国形态、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第一人是李大钊。李大钊所建构的史学话语特征突出体现在:其一,从社会经济角度考察历史发展规律;其二,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

者;其三,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既具有一般规律的属性,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受李大钊史学理论的影响,中国几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努力探索并开创了具有鲜明中国历史特点和民族特色的中国通史体系和理论表达,多人在史学理论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如刘剑横的《历史学ABC》、李则刚的《史学通论》、周容的《史学通论》、刘静白的《何炳松历史学批判》等都“明显地受到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的影响”^[27],又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都“把中国历史贯串在一条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主流上”^[28],引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再次高涨,不断完善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侯外庐曾经说过:“全赖大钊同志的教导,循著他指点的方向,我以研究《资本论》为起点踏上征途,从而确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决定了我一生的方向和道路。”^[29]他后来撰写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中国思想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倡导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历史研究,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为标志确定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尹达在延安时期出版的《中国原始社会》,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结合考古资料对中国历史作出了有价值的研究。

李大钊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先河,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现代化和科学化的进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力也随着中国史学科学化的推进而不断增强。“马工程”《史学概论》编写组 2009 年出版的《史学概论》教材,引用了颇多李大钊关于史学理论的论述并特别指出:“李大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中国史学史上首次科学地阐明了历史和历史学的区别。”^{[2]283}进入新时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在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破和立”的转向中,李大钊要构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恰恰显示出:“当今中国的

人文学术与社会科学研究正试图逐渐摆脱它对外来学术的‘学徒状态’,并从而提出其本己的‘自律性’要求。”^[30]

(二)彰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意蕴

五四新文化运动伊始,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在传播唯物史观的同时,致力于确立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指导地位。文化本身有其传承性和沿袭性,史学也是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选择以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既是由中国所处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也是历史学者在世界文化环境的积极影响下作出的正确选择。李大钊继承了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自觉地把研究中国历史同中国革命的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探索中国历史学的发展道路,他所构建的历史学体系和所秉持的革命史观都是为中国革命服务的,从而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学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光大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意义。

“革命史范式”在中国历史学界一度受到质疑,有些学者认为其局限于政治和革命的视角,难以展现社会变迁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甚至出现“告别革命论”的论调,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指导地位。事实是李大钊的史学理论不仅开创了史学研究的革命话语范式,而且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土地与农民问题、青年运动、工人运动等研究领域都有众多原创性贡献,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他的史学理论极具启发性、深刻性、批判性,因而能够一代一代地被人们所承袭。

李大钊关于史学理论的研究,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对历史本身作出的科学的、合理的解释。这里还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内容,即在变革时代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代化问题。首先,李大钊的史学理论是中国近代化历程的一个缩影,而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是一种传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承载着新的使命。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现代化要从“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

础”这一新的历史起点出发^[31],开始新的文化选择。其次,要开展丰富的史学实践活动,放开眼界的同时要立足现实,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与理论创造,只有这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才会越来越完善。

参考文献:

- [1] 宋学勤. 梁启超新史学的当代解读[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2.
- [2] 《史学概论》编写组. 史学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 [3] 晋荣东. 李大钊哲学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357.
- [4] 张静如. 李大钊论历史学:重读《史学要论》[J]. 历史教学,1989(11):2-6.
- [5] 张艳国. 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研究论析:本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研究之一[J]. 史学理论研究,1994(2):37-46.
- [6] 晋荣东. 《史学要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建构史学理论的最初尝试[J]. 历史教学问题,2003(2):16-19.
- [7] 吴汉全. 历史·历史学·历史哲学:李大钊对历史学几个相关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诠释[J]. 江海学刊,2004(2):145-152.
- [8] 李小树. 李大钊史学理论蕴含的几个观念[J]. 史学理论研究,2004(3):142-148.
- [9] 邹兆辰. 李大钊对“历史”概念的探讨[J]. 史学史研究,2010(1):53-59.
- [10] 欧阳哲生. 李大钊史学理论著述管窥[J]. 史学理论研究,2010(2):22-34.
- [11] 侯且岸. 李大钊新史观三题[J]. 北京党史,2010(4):35-37.
- [12] 沙健孙. 李大钊史学思想述论[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9):64-71.
- [13] 周良书. 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史学的变革[J]. 北京党史,2020(1):15-21.
- [14] 顾海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历程及其特质[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3):33-42.
- [15]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29.
- [16] 邹兆辰. 李大钊与西方历史哲学[J]. 史学理论研究,1992(1):38-49.
- [17]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8]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9] 朱仲玉. 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J]. 史学史研究,1981(3):68-73.
- [20] 王关兴.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李大钊[J]. 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1):27-33.
- [21] 陈宗海.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们[J]. 社会科学,1983(3):50-51.
- [22] 瞿林东.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5-17.
- [23]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4] 张汝伦. 史学与中国现代性:以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为例[J]. 学术月刊,2015(9):33-41.
- [25] 吴汉全. 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61.
- [26] 周文玖. 论李大钊《史学要论》对史学理论的贡献[J].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82-86.
- [27] 周文玖.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理论发展论略[M]//瞿林东.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28.
- [28] 翦伯赞. 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9.
- [29] 侯外庐. 韧的追求[M]. 上海: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5:12-13.
- [30] 吴晓明. 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J]. 中国社会科学,2011(2):5-13.
- [31] 习近平. 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N]. 人民日报,2015-08-24(1).

(责任编辑:白丽娟)